

# 明代西樵山的理学与书院文化

□ 任建敏

岭南大地，自古便以其独特的地理与人文景观著称。明代以降，随着珠江三角洲的加速开发与广府地区的崛起，岭南不再仅仅是“奇珍异宝”的汇聚地，更涌现出一批在政治、思想与文化领域影响全国的人物。其中，位于广州府南海县境内的西樵山，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，从一座寂寂无名的山岩，一跃成为“伯仲罗浮”“比肩岳麓”的理学名山。其核心驱动力，正是明代中期湛若水、方献夫、霍韬等一代名儒在此兴办的大科、云谷、石泉、四峰四大书院，它们共同构筑了明代西樵山璀璨的理学与书院文化景观，也成为浓缩明代岭南社会文化变迁的一面镜子。



《西樵山游览记·烟霞洞图》(大科书院所在地) 作者供图

## 【壹】时代风云与名儒归樵：西樵理学的滥觞

明代中叶，正德皇帝朱厚照继位后，素以荒唐著称。他疏于朝政，沉溺玩乐，宠信刘瑾等“八虎”。正德皇帝的种种行径，如自封“威武大将军朱寿”亲征、执意南巡、兴建豹房等，使得许多有气节的士大夫或选择激流勇退，或选择栖隐山林，以待时清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西樵山迎来了其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三位客人。

其一为湛若水(号甘泉)。湛若水是广东增城人，弘治十八年(1505)进士，是明代大儒陈献章(号白沙)的得意门生与衣钵传人。陈献章以“自然为宗”的理学思想开启了岭南心学之先河，湛若水则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，创立“甘泉之学”，

与王守仁(号阳明)的“阳明之学”并称明代心学两大宗。正德十年(1515)，湛若水因母丧丁忧返乡。面对正德朝的混乱政局，他选择暂离庙堂，将目光投向了风景秀美、适宜讲学的西樵山。

其二为方献夫(号西樵)。方献夫是南海孔边人，同为弘治十八年进士，与湛若水同年。他早年入翰林，后转吏部。在京为官期间，方献夫与王守仁同为心学阵营，但他更早地将目光投向西樵，以“西樵”为号，足见其对这座山的深厚情感。正德七年，他辞官南归，便有在西樵山定居讲学之志。

其三为霍韬(号渭崖)。霍韬出身南

海石头乡的寒微之家，凭借聪颖与勤奋，于正德九年(1514)高中会元，踏入仕途。不久回乡成婚，后又连遭父丧、妻丧。面对正德朝的政局，他亦选择暂避锋芒，在守制期满后并未急于返京，而是流连于西樵山水，与湛、方二人论学。

这三位岭南俊杰，或因避世，或因治学，或因乡情，不约而同地将西樵山选为其栖息与精神寄托之地。西樵山以其清幽的环境、便利的交通以及逐渐兴起的人文氛围，成为了他们理想的“江湖之远”。他们的到来，为西樵山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活力，也预示着一座理学名山的诞生。

## 【贰】四大书院的崛起：理学传播的殿堂

湛若水、方献夫、霍韬等人在西樵山的活动，并非简单的隐逸，而是积极地开创讲学事业。他们所创建的四大书院，成为了明代中期岭南理学传播的核心阵地，各具特色，交相辉映。

### 大科书院与云谷书院：湛若水的双壁

湛若水在西樵山的经营最为引人注目。他最初寓居于云谷，曾赋诗称“千秋云谷还归我”。但正德十二年(1517)，在方献夫的感情邀请和“留此峰久矣，以待甘泉子耳”的感召下，湛若水最终选择在大科峰西侧的烟霞洞卜筑。初期，他在此修建了“烟霞隐居”，作为个人修身与家庭安顿之所，并附设讲学场所。随着慕名而来的弟子日益增多，原有的规模已不敷使用。正德十四年(1519)，在弟子陈谟、霍敦等人的倡议和支持下，于烟霞隐居下方扩建，正式形成了以凝道堂、进修斋、敬义斋等为主体建筑的大科书院。

大科书院的成功，不仅在于其优美的山林环境，更在于湛若水为其制定的《西樵大科书堂训规》。这份训规详细规定了学生的作息(“鸡鸣而起，以寅、卯、辰三时诵书”)、学习内容(诵书、看书、作文、默坐思索、温书)、课堂纪律(“强调”“长幼之序”与“诚由中出”)，甚至对学生的家庭生活、与官学的关系等都做了周全安排。湛若水强调“科举乃圣代之制”，鼓励弟子应考，同时又巧妙地处理与官方提学官的关系，体现了其成熟的政治智慧。

在大科书院讲学期间，湛若水著述丰硕，完成了《二礼经传测》《古大学测》《中庸测》《论语》等重要著作，培养了杨鸾、陈谟、霍敦、甘学等大批优秀弟子。大科书院声名鹊起，时人誉其“几与岳麓、白鹿鼎峙”，西樵山也因此被誉为“道学之山”。

而在晚年，致仕返乡后湛若水并未忘怀其最初对云谷的钟情。嘉靖二十三年(1544)湛若水重新经营云谷，兴建了规模较大科更为宏伟的云谷书院。云谷书院设有祭坛、尊师堂(祀陈白沙)、会友堂、见泉楼等建筑，成为湛若水晚年讲学的重要场所。

### 石泉书院：方献夫的传习之所

方献夫是三人中与西樵山渊源最深者。正德七年(1512)辞官归山后，他便着手在石泉洞营建居所。正德十二年(1517)，建成紫云楼与沛然堂，名曰“石泉精舍”。嘉靖年间，因恭贴御赐书籍(《五经》《四书》《性理大全》等)，扩建为石泉书院，并建有御书楼。

方献夫对石泉书院及其周边的经营颇具匠心，形成了以书院为中心，辅以天湖、天湖亭、与鹿亭、爱瀑轩、留虹桥等景观的建筑群。其范围北至鬻门关，西含宝鸭池，东抵观翠岩，规模宏大。

作为王阳明的弟子，方献夫在石泉书院亦有传习心学之意。他曾与湛若水讨论陆九渊心学，并与陈激衷、王渐造(青萝)、何维柏(古林)等学者在此讲学论道。虽然关于石泉书院日常运作和传

学情况并未留下更多的文献记载，但其作为方献夫传播阳明学说、实践学术主张的重要场所，地位不容忽视。浙江学者方豪在为石泉书院所作的记中，盛赞西樵山因方献夫而闻名，称其为“天下之西樵”“天下后世之西樵”。

### 四峰书院：霍韬的宗族教育

霍韬在西樵山创建书院的时间较晚。嘉靖二年，他才购得西樵山宝林洞(原宝峰寺旧址)之地，创建精舍，后因御书楼的建立(嘉靖五年，1526)及精舍外四峰环列而改名四峰书院。

四峰书院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浓厚的家族教育色彩。它不仅是霍韬个人的讲学之所，更承担着培养霍氏宗族子弟的重任，是霍韬宗族建设计划中的重要一环。霍韬亲自为四峰书院制定《四峰书院事例》，详细规定了书院的经费来源、开支项目(包括教学、祭祀、日常维护，甚至京供、军餉等)，并强调子弟需“朝耕暮读”，将学业与生产相结合。

霍韬虽长期在外为官，但对四峰书院的运作极为关注，通过书信指导山长郭肇乾及四弟霍任等人管理书院事务，延请名师(如罗一中、梁大畜)教导子侄。他对子侄的教育要求严格，既强调儒家经典的熟读，也注重“圣贤事业”的熏陶，同时严禁奢侈恶习，要求勤俭持家。四峰书院的教育卓有成效，霍氏子弟中多人获得科举功名，霍韬的宗族建设也因此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发展的典范。

## 【叁】理学与政治的交织：大礼仪、毁淫祠及其影响

西樵山四大书院的兴衰，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，而是与明代中后期的政治风云紧密相连。

### 大礼仪的波澜

正德皇帝驾崩后，其堂弟朱厚熜(嘉靖皇帝)继位。年轻的嘉靖皇帝欲追尊其生父献皇帝，引发了与以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之间长达数年的“大礼仪”之争。在这场关乎皇权与礼制的激烈博弈中，蛰居西樵山的方献夫、霍韬等人敏锐地把握了时机，上疏支持嘉靖皇帝的主张，认为“继统”不必等同于“继嗣”，为嘉靖皇帝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。

他们的声援，虽在初期力量微弱，却为孤立无援的嘉靖皇帝送去了雪中炭。随着嘉靖帝在“大礼仪”中逐渐占据上风，方献夫、霍韬也因此获得皇帝的青睐，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，迅速崛起为嘉靖朝的重臣。方献夫官至内阁大学士，霍韬亦官至礼部尚书。湛若水亦官居南京兵部尚书。这场“大礼仪”，不仅改变了这几位学者的个人命运，也使得西樵山因其名儒的显赫而进一步提升了在全国的知名度。

### 毁淫祠与宝峰寺公案

明代中期，理学思想逐渐深入人心，部分理学背景的官员发起了“毁淫祠”运动，旨在打击不合国家祀典的民间信仰场所，推广儒家正统。嘉靖初年，广东提学副使魏校在广东大力推行毁淫祠政策，将许多寺观改为书院、社学，其田产也随之转移。

在这一背景下，西樵山宝峰寺的命运发生了转折。嘉靖二年(1523)，宝峰寺因“僧奸淫不法事”被官方下令拆毁。霍韬先是从友人黄重处承买了宝峰寺旧址，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四峰书院，并购买了部分寺田作为宗族祭田。此事在后世流传中逐渐演变为“霍韬强占宝峰寺”“毁寺葬母”等传说，成为一桩聚讼五百年的公案。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理学力量对传统佛教及民间信仰空间的竞争。霍韬、方献夫、湛若水等人在朝为官期间，亦曾多次上疏，主张限制僧道发展，打击“淫祠”，体现了他们作为理学家的共同立场。

## 【肆】盛极而衰：书院的命运与理学的传承

西樵山四大书院在正德、嘉靖年间盛极一时，但其辉煌并非没有隐忧。朝廷对民间讲学活动的警惕、不同理学思想之间的竞争，都为书院的命运埋下了伏笔。

### 禁毁书院的冲击

嘉靖皇帝对湛若水的“甘泉之学”始终存有疑虑。嘉靖十六年(1537)，御史游居敬劾奏湛若水学术偏颇，请求禁毁其书院。虽经吏部回护，湛若水本人未受严惩，但嘉靖皇帝下令改毁其未经明旨私创的书院，主要针对其在南京的讲学场所。嘉靖十七年(1538)，吏部尚书许讚再奏禁兴造，进一步限制了私创书院和印刷书籍。

更为沉重的打击来自万历年间。首辅张居正为整顿学政、强化朝廷对讲学活动的掌控，于万历七年(1579)下令禁毁天下私创书院。西樵山书院亦未能幸免。据郭棐《岭海名胜记》记载，广东地方官奉行禁令“急如星火”，导致西樵山“贤儒栖息之地”的书院遭受重创。大科书院因其盛名，成为重点整治对象，于万历九年(1581)被毁，其核心讲学场所凝道堂被彻底拆除。云谷书院则因其内设祭祀陈白沙之祠，改为白沙祠而得以部分保留，但讲学功能丧失。石泉书院因恭贴御赐书籍，在万历初的禁毁中得以幸存，但其藏书后来多有散佚，书院本身也于明末清初逐渐倾圮。四峰书院则通过改名为“西庄霍公祠”的变通方式，在禁毁风波中得以保全，并由霍韬后人继续修葺和使用，直至清初才逐渐荒废。

### 理学精神的赙续

尽管书院实体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，但西樵山所孕育的理学精神及其文化影响并未就此消散。湛若水晚年将其岭南讲学事业托付给弟子庞嵩。庞嵩在湛若水去世后，恪尽弟子之礼，不仅打理其家族事务，更继承其讲学大旗，在天关、西樵等地书院继续传播甘泉之学，维系了岭南心学的一脉香火。

明代西樵山四大书院所倡导的“敢为天下先”的创新精神、“兼容并包”的学术态度以及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”的家国情怀，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岭南文化。它们不仅是明代广东教育与学术的高地，更是广府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。

## 结语：天下后世之西樵

从一座默默无闻的岭南山峦，到声名远播的“天下之西樵”，西樵山的崛起，是明代特定历史条件下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合力作用的结果。湛若水、方献夫、霍韬等一代名儒，在西樵山培养了人才，传播了思想，塑造了风气，也深刻地卷入了时代的洪流。

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，大科、云谷、石泉、四峰书院的遗址多已难觅旧踪，或仅余残垣断壁。然而，它们所代表

的理学精神与书院文化，早已融入岭南的血脉，成为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。正如方豪所言，西樵山不仅是“天下之西樵”，更是“天下后世之西樵”。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，值得我们深入发掘与传承。明代西樵四书院的故事，不仅仅是岭南理学的兴衰史，更是一部浓缩了明代岭南社会文化史。

(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)

# 说“交子”——关于最早的纸币与银行

□ 王瑞来

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在宋代中国，叫做“交子”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。关于交子的产生，大多也耳熟能详。此前，疑似交子的铜版现身于成都，这一古老的纸币，又重新沐浴在人们注目的视线之下。

检视史料，发现围绕着交子的产生还有些聚讼，应运而生的纸币在产生的最初也充满坎坷。

北宋曾巩所撰的《隆平集》，在卷三《爱民》一文中记载：

蜀人以铁钱重，私为文券，谓之交子，以便贸易。既久，而或不能偿，民讼不已。天圣中，知益州寇瑛请禁之。上曰：“蜀民用交子久矣，罢之可乎？”下使者议，以为官置文券则可以利民，而止其欺。上曰：“果利民，其行之。”

详细的记载见于南宋人李焘的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(以下简称“《长编》”)卷一〇一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条：

初，蜀民以铁钱重，私为券，谓之交子，以便贸易，富民十六户主之。其后，富者资衰，不能偿所负，争讼数起。大中祥符末，薛田为转运使，请官置交子券以权其出入，久不报。寇瑛守蜀，遂乞废交子不复用。会瑛去而田代之，诏田与转运使张若谷度其利害。田、若谷议废交子不复用，则贸易非便，请官为置券，禁民私造。又诏梓州提点刑狱官

与田、若谷共议，田等议如前。戊午，诏从其请，始置益州交子务。

纸币在广义上的定义为，是由公权力强制流通而为用户认可的纸质通货。在纸币诞生之前的中国，多使用铜钱货币。宋代由于铜荒的发生，在四川、陕西等部分地域由政府铸造铁钱发行使用。

任何时代，需要都是新事物的“催产婆”。沉重的铁钱不便携带运行，因此便出现了以铁钱为准备金的信用凭证“交子”，以方便长途或者大宗交易。最初是由16家富商主持，在小范围内流通。

由于是私下的民间行为，后来就由于不能兑现而屡生纠纷。几经曲折之后，于天圣元年(1023)，政府权力介入，在四川设置交子务，像铜铁钱一样，禁止民间私造交子，改由政府印制发行。交子的面额，最初从1贯到10贯不等，后来逐渐定型为1贯和500文。发行有定额，以铁钱作为现金准备。并且以两整年为界，随易以旧换新。具有近代意义的纸币从此诞生，随之应运而生的，还有发行纸币的银行——交子务。

交子的使用一直延续到南宋初年，后来，被更定型的纸币会子所取代。公权力介入，使交子成为名副其实的纸币是在天圣元年，这有上述明确记载。那么，民间发行的交子，最初是在何时呢？《长编》上述的记载仅含糊地用一个“初”字

带过。翻检《长编》，我看到了一则较早的记载。卷五九景德二年二月庚辰条载：

先是，益、邛、嘉、眉等州铸钱五十万贯，自李顺作乱，遂罢铸，民间钱益少，私以交子为市，奸弊百出，狱讼滋多。乃诏知益州张咏与转运使贾观同议，于嘉、邛二州铸景德大铁钱，如福州之制。每贯用铁三十斤，取二十五斤八两成，每钱直铜钱一，小铁钱十，相兼行用，民甚便之。

由这条史料可知，交子的出现，与王小波、李顺暴动有直接关系。由于发生暴动，无法铸钱，民间交易缺少货币，因此才出现了替代物的证券交子。从小波起事到李顺被俘，暴动从淳化四年(993)持续到至道二年(996)。此时已届宋太宗末年。可以推测，交子的出现，当是此时。

关于交子出现后的曲折，还有聚讼。上面引述的史料已有披露，由于不能兑现，“不能偿所负”，以至“争讼数起”，甚至“奸弊百出，狱讼滋多”，这让一直以无狱讼的“狱空”为政绩的地方官很头痛，有人主张废止交子的使用。以上引述的《隆平集》和《长编》都提及寇瑛是主张废交子的代表人物。

然而，还有记载表明，寇瑛反而是让交子这一新生事物存活下来的人。《宋史》卷三〇一(薛田传)载：

民间以铁钱重，私为券，以便交易，

谓之交子。而富家专之，教致争讼。(薛)田请置交子务，以权其出入。未报。及寇瑛守益州，卒奏用其议。蜀人便之。

从这一记载看，最早提议设置交子务的是薛田。不过他的提议没有受到重视，泥牛入海无消息。后来，寇瑛到四川主政，旧事重提，才获准成立交子务，由政府正式接手纸币发行与监管业务。

这一记载与上述《隆平集》和《长编》的记载正相反。

寇瑛究竟是交子的拥护派还是反对派，可以说是纸币史上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。

其实，关于这个聚讼，南宋李焘已经有了考辨。他在上述《长编》卷一〇一交子务成立的记载之后，施加了一段注释，对事实进行了辨析：

《实录》、《食货志》皆云寇瑛请官置交子务。按《薛田附传》，则置交子务乃田为转运使时所请建，瑛守蜀，始用田议。然《成都记》载此事特详，瑛议盖欲官私俱不用交子，而田议始终皆欲集私造，官为主之。今置券，实从田议，瑛无与也。

《实录》、《附传》、《正传》、《食货志》俱误矣。

李焘的考证相当清楚，不容置疑。据李焘这段注释可知，上述《宋史·薛田传》正是源自宋朝国史本传。李焘作为一个杰出



交子图 作者供图

的历史家，没有盲从官方的《仁宗实录》、国史《食货志》以及国史本传的众口一词，而是根据当时他所能见到的地方史籍《成都记》，考证出寇瑛始终是交子的反对派，而薛田才是让交子这一新生事物存活下来的功臣。当然，根据《隆平集》的记载，最后一锤定音，拍板的还是皇帝。不过，此时宋仁宗尚未亲政，主政的是垂帘的刘太后。决策准确说应当是当时政府的主政者。

李焘的考证十分难能可贵，为后人廓清了围绕在交子产生之际的疑团。附言之，李焘的考辨还作为一种旁证，证明了《隆平集》把寇瑛记为交子反对派的准确性。

(作者现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，并执教于早稻田大学；国内担任四川大学特聘教授、河南大学讲座教授、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等)

羊城晚报

A5

理论

文史哲

2026年4月3日  
星期五  
责编 潘玮倩  
美编 陈日升  
校对 姚毅

